

# 帕森斯与民主社会

——评乌塔·格哈特的《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

王楠

## 一、“宏大理论的构造者”？

“塔尔科特·帕森斯或许是 20 世纪社会学史上真正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之一。”在《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Talcott Parson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的开头,乌塔·格哈特(Uta Gerhardt)这样写道(格哈特 2009:5)。在她看来,虽然有许多研究者从各个角度对帕森斯加以评论和指责,其实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思想和生活。他被称为宏大理论的构造者,端坐书斋不问世事,不过是构造了些“毫无实际意义的宏大理论的空中楼阁”,“从来没有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在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境中存在的问题”(米尔斯,2005:34-35)。有的学者指责帕森斯的学说是“反人类行动”的理论,认为他的系统分析根本否认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性(Homans,1964:809-818)。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帕森斯支持官僚—技术专家治国论(bureaucratic-technocratic state)的意识形态(Fredrichs,1970)。但格哈特认为,这些指控都纯属闭门造车。她的这部思想传记正是要“利用大量出版和未出版的资料,颠覆那些将这位美国社会学家中的佼佼者污名化的许多判断”(格哈特 2009:343)。格哈特试图证明,帕森斯根本不是生活在象牙塔中的书斋学者,他有着明确的现实关怀。无论是二战前后还是动荡的 60 年代,他都以一名社会科学家的身份积极投身于各种与政治紧密相关的研究和活动之中。而他的著作也同样与现实政治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学术研究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这部思想传记正是要展现,“他一生治学和个人问政都是致力于捍卫民主(democracy)”(格哈特 2009)。

但是,格哈特这个旗帜鲜明的判断乍看之下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

印象,使人觉得这种说法恰恰说明了米尔斯的判断是正确的,即帕森斯的理论如果去掉了“50%的晦涩用词”和“40%的教科书社会学”,剩下的10%恰好是“意识形态上的运用”(米尔斯 2005:53)。说帕森斯捍卫民主,不过是在宣扬某种意识形态。但是,格哈特的意思并非如此。在她看来,帕森斯支持所谓民主社会,并不是对某种单纯的政治体制的支持,而是对西方现代社会某种好的发展方向的肯定:

帕森斯对于民主体制的捍卫始终意味着,他看到了社会发展的两种相互对立的可能性:一种极端是失范(anomie),另一种极端则是整合(integration)。当然,只有后一种意味着民主,尽管它也总是受到威胁,有可能坠入某种失范(例如麦卡锡主义)。这种双重聚焦使整合—失范这一区分成为某种变项。在他的思想生平的四个阶段里浮现出来的主题,标志着民主化进程的得与失(与复得),正是这激发着他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与时俱进。(格哈特 2009:11)

对格哈特来说,民主社会也就是整合的现代社会的代名词。而另一方面,民主也是“一种社会行动的结构,意味着公民对于其所在共同体的自愿承担”(格哈特 2009)。在她看来,帕森斯一生的理论关怀就是要探索在理性和工业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社会如何能够避免失范和偏离(deviance),实现整合与秩序,在肯定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公民对自身所处社会义务的普遍承担(commitment)。她的这本思想传记,正是要将帕森斯置于其所处的思想和历史背景之中,将他的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加以深入的理解。

## 二、失范社会与民主社会

格哈特用“民主社会”这样的概念来表示帕森斯所肯定的整合的现代社会,其根源正来自帕森斯早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前纳粹德国的民主与社会结构》(*Democrac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Pre-Nazi Germany*)。帕森斯在文中对德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进行了分析,将其与英美的“‘自由民主’类型的社会”加以对比(Parsons, 1969:65

-81)。而帕森斯这篇文章正是要说明在同样的理性化和工业化趋势面前,德国不同于英美的种种特点。格哈特传记的第一章正是试图将《社会行动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置于当时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下,来揭示这本表面上看似是高度抽象的理论叙述,其实针对的乃是当时的经验社会。她认为,帕森斯正是看到了当时与英美民主社会相对的德国的种种乱象,而试图在《结构》中从强力(force)与欺诈(fraud)、失范(anomie)、仪式(ritual)与克里斯玛(chrisma)三个方面入手,描述一种欧洲的受失范驱动的强制型系统社会,并将其与合法、安全和理性的整合社会加以对比,从而构建一种以失范社会为一端、整合社会为另一端的双翼的(two-pronged)社会行动结构(格哈特,2009:44)。

格哈特认为,在《结构》一书中,帕森斯从强力与欺诈、失范、仪式与克里斯玛这三个方面描绘了与整合社会相对立的失范社会。他从霍布斯的战争状态中引出,在缺乏约束性控制的情况下,人们会不择手段地运用强力和欺诈来谋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强力与欺诈,正好对应帕累托的“狮子”和“狐狸”类型的精英。在涂尔干和韦伯那里,强力和欺诈正是缺乏合法规范和道德义务的状态(格哈特,2009:45-48)。而失范则与强力和欺诈形影相随。在失范状态下,社会秩序瓦解,人们找不到方向和出路,往往以彻底功利主义的态度来行动,缺乏真诚的道德义务。失范状态往往出现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体现了规范的定向力的式微,是社会整合的最低点(格哈特,2009:48-51)。面对强力、欺诈和失范,人们往往会转向仪式/克里斯玛来寻求拯救之道。通过寻求拥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肯定他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将完全服从于他视为自己的义务,人们力图摆脱失范的混乱状态。这样的克里斯玛型的领袖,超出了合法性(legitimacy)并赋予具体的制度和规则以合法性(格哈特,2009:52-55)。格哈特认为,在强力、克里斯玛和失范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所谓失范或缺乏整合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其实是前纳粹和纳粹时期德国的写照。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急速变化导致了失范,而人们又转而寻求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秩序,而是偏离的狂热、乌托邦式的幻想和侵略性地寻找替罪羊。帕森斯本人在其文集——《政治与社会结构》(*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中第二部分的4篇文章,正是对这一时期德国状态的更为详尽的描述和探讨(Parsons,1969)。

那么帕森斯自己所肯定的整合社会又是什么样呢？在格哈特看来，帕森斯在《结构》一书中间接说明了整合社会秩序的几种特性：法律性（legality）、安全性（security）与合理性（rationality）。在由主权者来确保安全的整合社会中，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法理调控对社会的秩序不可缺少，而基于人们共同努力的交流中的合理性也极为重要。格哈特认为这三个因素体现了关注共同规范的整合社会的道德价值，而社会秩序是对这种道德价值的表达（格哈特 2009:58 - 61）。帕森斯眼中的社会学，正是要努力说明能够体现“共同价值整合”的社会行动系统（格哈特 2009:63）。在她看来，《结构》一书绝不是对经典社会理论的概述，必须从蕴含政治关怀的科学观、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寻求整合的民主社会三条线索入手，“才能充分领会帕森斯在此书中所探求的多维知识旨趣与复杂精致的论证”（格哈特 2009:65 - 66）。

### 三、帕森斯的“应战努力”

如果从传记的角度来衡量格哈特的这本书，那么它的第 2 - 3 章似乎最符合这一标准。在这两章中，格哈特用大量的资料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与通常的书斋学究形象极为不同的帕森斯。在 1938 - 1951 年这一时期，帕森斯的生活和工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 1938 年到 1945 年，帕森斯发表了 9 篇与战争有关的文章，写了 3 份未曾出版的文稿，撰写了至少 14 篇电台演说，为各种团体和机构撰写了一堆讲义、备忘录和报告（格哈特 2009:77、168）。1940 年夏，帕森斯加入了旨在抗击法西斯主义的民主议事会的通讯委员会，还加入了哈佛大学的“捍卫美国”小组，并当选为国民士气委员会主席，组织关于德国社会结构的讨论，为美国的政策和计划提供知识支持。1943 年，帕森斯与时任哈佛海外管理学院院长的弗里德里希合作，参与培训未来对德军管官员项目的筹备，为项目管委会撰写备忘录，并作为教员亲身培训军管人员。1945 年 3 月到 10 月，帕森斯出任华盛顿外国经济管理署敌国处兼职顾问，负责拟定对德解除军备和削减工业产能的措施，并在此期间积极反对旨在彻底铲除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同年 8 月，就在原子弹投放之后两天，帕森斯给《纽约时报》写信，呼吁解决世界和平必须借助社会科学家的力量，扶植关于人类关系的科学，以

人的头脑来解决有关世界和平的人的问题(格哈特 2009)。帕森斯以其积极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面临重大事件时,以自己的方式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的社会科学家的形象。

那么帕森斯在这些活动中体现了什么思想呢?格哈特指出,帕森斯在二战时期将自己在《结构》中提出的社会的失范与整合的双翼理论继续推进,提出了一套针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学,并将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社会加以对比(格哈特 2009:72-73)。

在1942年写就的两篇文章中,帕森斯分析了前纳粹和纳粹时代德国的基本特征。在他看来,一战后的德国面对工业化和理性化的社会变迁,社会陷入了不稳定的失范状态,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散漫漂移的侵略性情绪,这种心态再加上德国社会中土地贵族和军队具有高级地位的传统结构,以及德国固有的带有强烈浪漫和怀旧色彩的乌托邦主义,导致民众对倾向于自由派的魏玛共和时期的政治强烈不满,并将犹太人视为现代工业社会侵害德国的祸首(格哈特 2009:116-119)。

在这种情形下,纳粹党应时而生了,打着恢复纯洁、强大的德国的旗号,赤裸裸地宣扬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而这恰恰又迎合了民众的心态。在失范中痛苦挣扎的民众失去了理性,将自身散漫漂移的侵略性情绪发泄在作为替罪羊的犹太人的身上。纳粹党在德国建立起了一种克里斯玛型的政治,要求普遍和绝对的服从,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大肆迫害。他们以革命型和破坏型的宣传来鼓动民众皈依自己,破坏了司法独立性,使德国从法理权威转变为克里斯玛统治(格哈特 2009:108-110、116-120、124-125、147-148)。1940年,在提交民主议事会的备忘录中,帕森斯概括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五个特征:与种族主义密切相关的民族主义、认为人人都平等的同胞同志的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反智主义、军国主义和体现在元首制这种特殊类型的科层组织上的特殊主义(格哈特 2009:95)。

与之相对,帕森斯指出了美国的民主社会的几项基本要素:宪治和法治、公民自由权利、机会平等、认同公民共同体、理性批判精神和行动主义。有制度规范基础做保障的自愿性和交互性的社会交往和控制,以及倾向于肯定现实基本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巩固型宣传,都有助于一般民众人格的健康,使他们保持一种“心绪稳定、积极乐观、乐信少疑、热情好奇、讲求理性、自由开明和体察他人”的心态。而在民主社会

中 积极行动、理性、伦理普遍主义和功能专门性四项一般性原则决定了职业领域或“经济”、宪治民主政府和制度化的自由权利这三大系统。所以,虽然美国也存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反智主义等倾向,但美国的人格品性、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和基本价值决定了美国不会走上德国式的道路(格哈特 2009:95-96、98-100、124-125)。

格哈特指出,虽然存在着对立和差别,但是,帕森斯并没有否定德国走向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可能性。相反,他在积极寻找能够将德国引回来的合理道路。帕森斯认为德国社会在根本上并未完全排斥许多好的文化模式和结构要素,纳粹也没可能完全取消这些东西。因此,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社会控制和制度改造来引导。需要用社会控制的方式来改变德国传统的权力集团,并在经济或职业系统中引入变革,使其由传统的强调先赋转向强调获致,以促进普遍主义—获致类型价值的制度化。要倡导西方文明传统中的普世性价值,以此来促进德国人的包容性。对于主张铲除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帕森斯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战后政策应当“有助于让德国人民重新定向”,“将德国的能量重新导向和平的渠道,尽可能发挥德国人的责任。而不是让我们去照着他们,替他们做事情”。所以,应当鼓励德国的工商业发展,提高“个人成就”在德国的地位,以消费导向型工业和小型资本主义企业来克服工业军事化。决不能由法国兼并莱茵—鲁尔区,那只能促进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格哈特 2009:142-145、149-155)。

格哈特认为,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帕森斯的著述仍然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应战努力,许多战争中思考的主题都被带入了这一时期的作品。而在帕森斯的巨著《社会系统》(*The Social System*)中也包含着许多战时的思考。如在第7章的“偏离行为倾向的社会结构”一节中,可以明显看出帕森斯心目中考虑的是纳粹时期的德国。如纳粹党清晰体现了偏离行为的强迫遵从和被动遵从这两种模式。过度的浪漫—乌托邦主义声称偏离行动才是对真正价值的实现,掀起克里斯玛型的革命运动的方式来实现系统变迁(Parsons, 1951:283-297、520-525)。格哈特甚至认为,不妨将《社会系统》看做是由哈佛大学社会科学应战努力所激发的产物,这部著作是反复盘点社会科学在二战期间的贡献而得出的新成果(格哈特 2009:216)。

#### 四、一般媒介理论与民主社会

与更像传记的第 2 - 3 章相比,《评传》一书第 4 章更像“思想研究”。实际上,只有在这一章中,格哈特才充分展开了她对帕森斯思想的分析。她认为在 60 年代,帕森斯在肯尼迪政府自由进步主义的激励下,彻底重述了自己的系统理论,在思考方式上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其主要成就便是帕森斯关于一般符号媒介(*generalized symbolic media*)和社会共同体(*societal community*)的理论。格哈特将互动媒介和社会共同体视为帕森斯此前的双翼理论的延续,认为二者是在失范和整合之间变化的现象(格哈特,2009:226 - 228)。而帕森斯以互动媒介和社会共同体为核心的晚期理论更体现了他对民主社会的支持。

格哈特对帕森斯的一般符号媒介理论的分析,是从帕森斯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的批评入手的。她指出,帕森斯对米尔斯的批评,根本在于认为米尔斯误解了权力(*power*)的性质。“米尔斯认为,权力这种工具并不是处在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中,并代表这个社会执行功能,而是完全被解释成这样一种工具,作为当权者的一个群体,通过防止作为‘在野者’的另一个群体获取其所需,而获取自己所需”(Parsons,1969:199)。帕森斯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权力并不只是被社会中某些群体所掌握、为不同群体你争我夺的工具,

权力是社会一种一般化的工具或资源。它必然被分割或分配,但也必然被生产。它具有分配性功能,也有集合性功能。它是一种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以达成某种一般性“公众”认同已经作出或可能作出的目标。它首先是对于各人和群体的行动的动员,通过这些人和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来约束他们。(Parsons,1969:200)

在帕森斯看来,权力必须置于社会系统之中来得到考虑,必须考虑其社会性、流动性、功能性和再生产性。米尔斯则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帕森斯主要将权力置于社会系统的政体(*polity*)的子系统来考察,权力是关系性的。一方面,权力的分配与科层制的政体结构相关,处于一定的决策位置上、承担某种职位的人拥有相应的权力;另一方

面 权力本质上是一种代表权力 (delegate power) ,处于一个集体中的每一成员都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力。科层制系统中的某个职位所拥有的权力,要依靠支持系统也即民主的选举制度来获得。支持系统与官僚系统是政体的两个面,借助一套程序性的制度,在普遍公民权的基础上来选出拥有权力和职位的角色,而连接这两个方面的关键就是选举。政体的目标是通过运用权力、执行集体目标来确保集体目的的实现 (Parsons, 1969:322 - 327)。另一方面,如同经济领域内生产产品一样,在政治领域内,政体系统的产品是权力 (帕森斯, 1988:148)。正如格哈特指出的,帕森斯将权力比作货币,将西方民主政府的机制比作“权力银行”,正是要说明权力的这种流动性、功能性和再生产性。拥有公民权的选民,通过投票将权力“存储”进官僚制的政府系统,选出领袖,而领袖和官员则运用权力来执行集体目标,当政府能够良好地达成集体目标的时候,党派、领袖和官员的成功“投资”就获得了“信用”,从而能够借助竞选机制,继续从选民的手中获得权力 (格哈特, 2009:243 - 244)。所以权力可以增长和扩张,在政治领袖与选民之间,借助任务承担和选举机制而实现的权力的存储关系,使领袖的好的“投资”能够确保自身的“信用”扩展,获得更多的选票。而在这个过程中,政体以权力的流动为中介,成为了一个承担集体服务的有活力的系统 (Parsons, 1969:342 - 348)。

因此,政体的根本在于权力的生产和分配,而这个过程要依靠政党体系和民主选举制度来实现。帕森斯在《美国政治系统的‘选举’与均衡》(“*Voting*” and the *Equilibrium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一文中详细分析了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运作机制。他指出,借助以两党制为核心的民主选举机制,政治系统能够借助权力媒介的流动而不断在投入与超脱、稳定与灵活、共识与分歧、进步与保守之间寻求合理的均衡点,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系统的一种动态平衡的整合,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系统稳定所必须的四项功能要求也能够得以实现 (Parsons, 1967:236 - 263)。正如格哈特所指出的,投票的结构同时促成了稳定与动态,促成了一个系统“相对稳定……能够整合形态各异的多元利益,并适应变迁环境”(格哈特, 2009:236)。正是借助民主政治的机制,权力作为一般性媒介在政体内流动并发挥作用,实现了政体的功能并促进了社会系统的整合。

实际上,权力只是社会系统中政治子系统的一般媒介,在经济

(economy)、社会共同体和模式维持子系统这另外三个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之中,存在着与权力类似的另外三种一般符号媒介:货币、影响(influence)和价值承担(value - commitment)。格哈特指出,这三种符号媒介在各自的领域中,以与权力类似的机制发挥着动态整合与功能实现的作用。作为“影响银行”的自愿团体,通过舆论将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人的影响集中到自身,获得声望、得到普遍的信任,再借助说服的方式来影响大众。而“承担银行交易(commitment banking)”会使得某些个体或团体在社会中被赋予更高的道德责任,获得其他社会成员的忠诚,从而承担作为道德领袖的地位。帕森斯指出,这样的一种“承担银行家”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但是如果价值承担不是以强迫遵从的方式,而是受到“承担银行交易”的“信贷网络”的制约,保留每个“寄存”价值承担个体“撤回”忠诚和支持的可能,价值革新就只能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实现,克里斯玛领袖就不会走向绝对权威。(格哈特 2009:250 - 254、258 - 264)。这四种一般符号媒介不仅在各自的子系统之内生产和流动,彼此之间还有着交换流通的关系,如权力的集中和发挥作用与货币、影响和价值承担等紧密相关。而在四种符号媒介之间也存在着控制论意义上的等级序列,自低到高依次是货币、政治权力、影响和价值承担(格哈特 2009:268)。格哈特(2009:273 - 274)指出,晚期的帕森斯试图将一般化媒介和控制论意义上的控制观念结合起来,用以理解现代民主体制。

格哈特还指出,帕森斯在 60 年代的另一项理论成就集中于社会共同体方面。他认为在社会共同体的兴起过程中存在着分化(differentiation) — 包容(inclusion) — 升级(upgrading)的三重动力机制,借助这样的动态进化过程,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自由和普遍权利都能够得到保障,同时,社会共同体的团结和整合程度也不断得到提高(格哈特 2009:286 - 287、292、308 - 310)。

## 五、个人历史与理论解释

帕森斯在回顾其学术生涯的文章《建造社会系统:个人历史》(*On Building Social System Theory: A Personal History*)中承认,以自由企业和民主制度为标志的现代西方社会在 30 年代遭遇的危机局面是《社会

行动的结构》的写作背景。谈到对现代西方社会的理解,他并不同意马克思和韦伯的某些观点。在他看来,在北美出现的现代社会的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并不是严酷的阶级分化和高度的官僚化,而是以团体—多元主义(associational-pluralistic)为特点,与分散性的治理式的民主相结合,表现为联邦制、分权、教会和国家分立,以及并非完全吸收式地包容各种宗教和族群。而与之相伴随的新的工业经济,其基本模式既非功利个体,也非社会主义式的集体,而是角色分化与规范结构相结合,以及有感情基础的团结和有文化基础的合法价值(Parsons, 1970: 855-858)。实际上,帕森斯一生的努力正是要指出,工业化和理性化成为必然命运的现代西方社会,仍然有着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所描绘的危机和悲观图景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体现在具有以上诸特点的自由民主社会的身上,其代表就是美国。正如利兹所指出的,帕森斯一直想要用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确立一种关于美国社会的正确的研究取向,以反对那些对美国社会的歪曲理解(Lidz, 1991: 108-136)。而像古尔德纳那种认为帕森斯的理论与美国社会两不相干的批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Gouldner, 1970)。在这个意义上,格哈特的基本命题的方向是正确的。她借助“双翼理论”的逻辑来说明帕森斯思想中彼此对立的失范和整合社会,并且正确地看到了帕森斯的理论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旨在分析经验社会,寻找克服失范之道。她试图将帕森斯的论述置于其身处的时代环境之中来理解,并大力挖掘帕森斯在二战期间所做的报告和备忘录,以说明他的现实关怀。格哈特对帕森斯的一般化媒介理论的强调,正在于她看到了帕森斯的一般化媒介的“银行”模式正旨在说明现代社会各个子系统中的权力、影响等一般媒介能够将普遍和特殊、个人与团体、平等与等级、集中和分散、变化与稳定这些矛盾方面调和起来,而非趋于极端化的控制—支配或革命—反抗,正是有了这样的“民主”,才有了现代社会的健康与活力之源。

就“民主社会”意味着现代西方社会的出路而言,帕森斯确实可称为民主社会的捍卫者。作为带着二战的伤痛成长起来的一代德国人,乌塔·格哈特敏锐地意识到了帕森斯这个深受美国和德国这两个文明浸染,又亲眼目睹、亲身参与其巨大碰撞的思想家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对于我们这个虽不属于西方、但却深深卷入现代世界历史命运之中的文明,要更深入地理解他人和自己,这也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

不过,纵观格哈特的这本思想传记,她的具体论证仍然存在着诸多

缺陷,从而难以充分支撑起这个“民主社会命题”。格哈特始终试图将帕森斯置于其所处的思想和历史背景之中,结合其个人生活和行动,来说明其理论的核心问题,却未能使得理论和历史水乳交融。其根本问题在于她对帕森斯本人著作的细致解读还不够,未能用他自己的概念体系进行讨论,因而难以从理论上充分理解帕森斯对民主社会的完整观点。对于帕森斯这样的理论家来说,经验现实只有借助概念才能得到充分的把握。因此,格哈特的论证始终不够充分。就其最核心的作为“双翼”的民主/整合社会和失范社会这对概念来说,在前3章中,格哈特始终未能从具体机制的角度充分论证其运作机理,而只是从帕森斯的著作中寻找某些“特征”来说明。从下面这段话可以很好地看出格哈特的理解:

在帕森斯的社会观中,社会共同体标志着整合。而纵观其著述,整合又标志着民主,与(从集权主义到传统主义的)独裁专制相对立。(与分化平行发展的)整合意味着现代化,而与倒退或欠发展相对立。鉴于社会共同体是民主体制的典型缩影,它也是一种变项,因为它标志着整合性力量的实现。(格哈特,2009:319-320)

这种过于简化的分析方式,给想要清楚地理解帕森斯的读者一种模模糊糊、意犹未尽的感觉,既容易包含错误,也易于使人产生误解。直接将民主社会等同于整合社会这种简化做法没有遵循帕森斯本人的完整概念体系,使得她只能用一些“特点”来拼凑出整合社会的面貌。如果民主或整合社会就意味着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就意味着美国,就意味着值得捍卫,而更深入的分析 and 更充分的讨论都不必要,那么这样的一种“捍卫民主”,确实容易让人觉得只是某种意识形态宣传。另一方面,这也造成格哈特对帕森斯的思想把握得过于简单,她的分析过于集中于晚期的一般媒介理论方面,而对帕森斯思想的把握相当不完整。<sup>①</sup>总的来看,她对《结构》和《系统》的解释过于薄弱。

此外,忽略理论自身的逻辑,过于借助历史现实和直接的争论文章来说明帕森斯的意图,这实际上也会导致过分强调帕森斯的经验面向

<sup>①</sup> 可对比帕森斯本人对自己理论阶段和关注核心变化的讨论(Parsons,1970:842-848)。

和现实的影响。格哈特严重依赖帕森斯战时所做的备忘录、演讲和报告这些具有高度应用性的文章,这容易流于表面化的结论和判断。认为美国现实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理论模型的“重大变化”的观点也有待推敲。对于帕森斯来说,理论虽然包含着对政治的观点和评价,但学术并非政治观点的直接表达,理论建构与现实环境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一方反映另一方。

因此,要想更深入地把握帕森斯的意图,更深入地理解现代西方社会的性质,只能对帕森斯的著作做更深入的研究。要从他自己的概念出发,细心地思考他不同时期著作之间的关系,决不能只是简单地从他某一时期的思想出发而轻视他的其他著作。正如格哈特在本书卷首语所引用的帕森斯的那句话“如果你认为,对于这些东西,乍读之下即可理解,那可要小心了。你会领悟一二,但要真正理解,还得不断地追索、回味、再追索”(格哈特 2009)。

#### 参考文献:

- C. 赖特·米尔斯 2005,《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
- T. 帕森斯 1988,《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 2003,《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乌塔·格哈特 2009,《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Friedrichs, Robert W. 1970, *A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erhardt, Uta 2002, *Talcott Parson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uldner, Alvin W.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 Homans, George C. 1964, “Bring Men Bac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 Lidz, V. 1991, “The American Value System: A Commentary on Talcott Parsons’s Perspective and Understanding.” In Roland Robertson & Bryan S. Turner (eds.), *Talcott Parsons: Theorist of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Parsons, Talcott 1951, *The Social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67,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69,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70, “On Building Social System Theory: A Personal History.” *Daedalus* 99(4).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杨 可